

雙方是一致的。積極主張融合的左派自由主義者無論多麼出於無意，卻在現實中切斷了黑人文化獨立發展的進程。要求增加黑人院校的呼籲被種族融合的趨勢給抵消了。「融合教育」的另一負面影響是：白人開始從城市遷移到郊外，加快了城市衰落，又使得白人工人階層開始反對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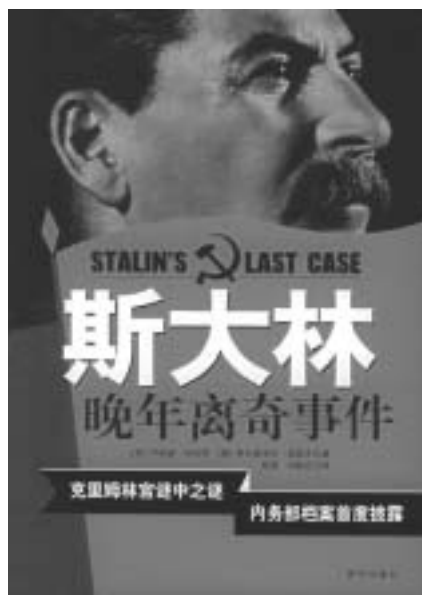
雖然丹尼爾用“lost revolutions”作書名，可是他心目中的“revolutions”內涵與我們一般漢語語境中的「革命」的內涵有所不同，在書的

末尾，他遺憾地說道：因為白人精英的反動抵抗，「破壞了社會環境和種族之間的關係，種族的融合不是出自人們的良心、也不是開明領袖努力的結果，而是來自於法律和訴訟，在人們心不甘、情不願的服從中形成」（頁305）。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所期待的、認為本來要發生的“revolutions”是源自人的良知，是在先覺的精英的引導下自覺地產生的人們觀念的變革。這大概與提倡「告別革命」的中國學人的意願是同樣的吧。

## 人性的地獄

### ● 沙 水

魯迅翻譯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揭示了十月革命後蘇俄政治生活中權力對人性的腐蝕。魯迅之所以譯這本書，未嘗沒有心懷對中國前途的擔憂。他早在《失掉的好地獄》中就表明了他對「革命」的黯淡評價：如果「革命」最終不能使人性得到解放，而只是使人性從一個地獄墮入另一個更壞的地獄，這樣的命，不革也罷。



布倫特 (Jonathan Brent)、諾莫夫 (Vladimir P. Naumov) 著，殘雪、鄧曉芒譯：《斯大林晚年離奇事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記得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我唸初中的時候，俄語老師教我們唱了一首俄語歌，歌詞翻譯出來是：

斯大林和毛，在聽我們，在聽我們，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進、前進、前進！為廣大勞動，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幟下前進！

當時「三年困難時期」剛剛過去，饑餓的強烈感覺尚未忘卻，但每當唱起這首歌，我就感到一種自豪，一種光明和雄壯，覺得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在應和着歌的旋律，生氣勃勃地齊步行進在歷史的大道上。後來雖然這種感覺被中蘇論戰和「反修防修」破壞了，但一提起列寧和斯大林所締造的蘇聯，內心仍然有一種純潔的崇敬，包括後來在鄉下

冒着被檢舉的危險用半導體收音機偷聽「蘇修」的對華廣播，經常聽到這首熟悉的旋律，每次都湧上一股激動和嚮往之情。奇怪的是，真正使我從這種幼稚的幻覺中走出來的並不是愈演愈烈的中蘇對立，而是一本小說，即魯迅翻譯的革拉特柯夫 (Fedor Gladkov) 的《土敏土》(Cement) (另有人譯作《水泥》)。這本書今天已經不大有人會去看它了，但當年對於我來說無異於醍醐灌頂，它把十月革命後蘇俄社會那種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勾鬥和權力對人性的腐蝕非常真實地揭示了出來，而且充滿了哲理。我猜想魯迅當時之所以譯這本書，未嘗沒有心懷對中國未來前途擔憂的意思，他早就料到一旦革命成功，他將是第一批被清除掉的「分子」。當然，儘管如此，他仍然擁護這場革命，就像革拉特柯夫書中所悲壯地宣示的那樣。但魯迅早在《失掉的好地獄》中就表明了他對於「革命」的黯淡評價，是不同於一般未經世故的「左翼文學青年」的。至少他表達出這樣一個思想：如果「革命」最終不能使人性得到解放，而只是使人性從一個地獄墮入另一個更壞的地獄，這樣的命，不革也罷。

《斯大林晚年離奇事件》(Stalin's Last Crime: The Plot against the Jewish Doctors, 1948-1953) 的兩位作者，一位是俄羅斯官方歷史學家諾莫夫 (Vladimir P. Naumov) 教授，另一位是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前蘇聯問題研究學者，也是歷史學家的布倫特 (Jonathan Brent)。他們利用最新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以最確鑿真實的事實，揭示了當時蘇聯社會在斯大林晚年獨斷專行和個人崇拜的絕對控制下人性墮落的殘酷現

實。由於一些最機密的檔案公之於眾，書中澄清了一些長期的誤解和謎團，但同時又帶出了更多謎團，如斯大林的死因等等。斯大林究竟是死於疾病，還是死於陰謀？這一類的歷史之謎恐怕是永遠也不可能破解了，因為它們往往並不只是由於資料的湮沒，而且也可能由於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原因，而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但本書的一個好處就在於，在盡可能搜集確鑿資料的同時，作者也把我們帶到了這種不可言傳的內心秘密的門口，引人遐想。也許正是由於這種把歷史資料和心理預期緊密結合的寫作方式，使得讀者在閱讀此書時感受到一種類似於偵探小說的刺激。難怪在書後面所引的一些著名人物的讀後評論中，人們用了像「離奇」、「驚險」、「穿透力」、「迷宮」、「偵探小說」等等字眼。如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評語：「我幾乎是當作驚險小說來讀的，並為它所深深打動。」

1948年，可以說二戰和衛國戰爭的災難剛剛過去，斯大林就開始醞釀新一輪清除異己份子的運動。這次運動的由頭是政治局中僅次於斯大林本人的二號人物日丹諾夫 (Andrei Zhdanov) 因心肌梗塞而逝世，其實在此之前日丹諾夫已經失寵，但似乎是由於克里姆林宮的主治醫生們玩忽職守，導致了他的早逝。這樣一個大人物的逝世，正如蘇俄歷史上的慣例 (如基洛夫 [Sergei A. Kirov] 被暗殺) 一樣，通常都要引發一場與此相配的政治地震。而這次政治風暴從來勢上看，甚至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因為實際上這次大清洗主要針對的並不是政治

1948年二戰剛過，斯大林就醞釀新一輪清除異己的運動。這次運動的由頭是政治局中的二號人物日丹諾夫逝世。這次大清洗主要針對的是知識份子階層中潛在的反對派，特別是猶太裔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佔據着科學、藝術、文化和教育領域的重要位置」。這場運動要不是因斯大林猝死而中止，必將演變成類似於中國文革式的意識形態災難。

由人為導演而產生的「小人物打敗大權威」的戲劇，在每次政治運動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開場鑼鼓。克里姆林宮醫院心電圖監測員季馬舒克告發上司玩忽職守導致日丹諾夫非正常死亡，獲頒「列寧勳章」。斯大林死後，「醫生陰謀」被證明子虛烏有，季馬舒克的勳章也被取消。在政治運動中，一個只認死理的小人物要麼面臨自己死無葬身之地的危險，要麼對他人構成極大危險。

上的敵人，而是知識份子階層中潛在的反對派，特別是猶太出身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佔據着科學、藝術、文化和教育領域的重要位置」。反猶主義和反對文化、反對知識就這樣結合在一起。可以預料，如果不是斯大林神秘的猝死中止了這場運動，它必將演變成一場類似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式的意識形態災難，並可能更慘烈。

在所謂「醫生案件」中受到迫害和株連的人，除了以猶太裔醫生為主體的一大批蘇聯頂尖醫學泰斗外，還有一大批在衛國戰爭甚至十月革命年代立過赫赫戰功的英雄，他們在當年是那麼的英勇無畏，勇於犧牲，但現在卻變得如此猥瑣、油滑、工於心計，在與同僚的互相傾軋和各自自保的殘酷鬥爭中，競相比賽着誰更加卑鄙無恥。在政治較量中通行的規則是，那些下手最狠的人往往是那些須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對領袖的忠誠的人，而這種人通常都是一些無名之輩，甚至是一些宵小之徒和有劣迹的人。例如通過陰謀手段排除他的德高望重的上司而爬到權傾一時的高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和專案重案局局長）的留明（Mikhail D. Ryumin）之流，他們沒有尺寸之功可以依仗，甚至還必須洗刷自己過去的污點，所以在任何政治運動中都爭先恐後地充當着打手和「積極份子」的角色，幹出匪夷所思的「絕活」來。所以每當一個政治運動須要人為地大力來推動之際，這種人常常受到重用，哪怕當權者明知他們品質惡劣，虛報浮誇，不可信賴，也仍然為了一時的需要而委之以重任，因為他們作為整人的工具最好使、最無二心。這樣，由人為導演而產生的「小人

物打敗大權威」的戲劇，在每次政治運動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開場鑼鼓。而且，由於這些人除了依附權勢之外別無一能，或者由於他們的劣迹被導演者掌握在手，在用不着他們的時候清除起來也更容易，因此他們的下場往往也很悲慘。

更為可悲的是，在這場人為的災難中，不少人明明知道在這種局面中玩政治是一個火坑，但出於眼前利害的驅使還是要不由自主地往裏面跳，其中的兩難和不得已，往往不足為外人道。其實在蘇聯高層圈子中，與「克格勃」特務無處不在的同時，也不乏對蘇維埃國家和斯大林本人絕對忠誠的人。例如日丹諾夫之死案件的揭發者、克里姆林宮醫院心電圖監測員季馬舒克（Lidia Timashuk），本人就是克格勃特務。她出於對本職工作的忠心耿耿而冒着極大風險給有關方面和斯大林寫信，告發她位高權重的頂頭上司在對日丹諾夫的診治過程中玩忽職守，說他們故意違背醫學常識，導致了日丹諾夫同志的非正常死亡。這一告發後來成了「醫生案件」的導火線。季馬舒克的告發信先是得不到上面的反應，反而被透露給了她的頂頭上司，導致她自己被撤職下放；然後在上面感到「適當」的時候，對「醫生陰謀」立案調查，她一夜之間成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的英雄，被授予「列寧勳章」；而斯大林死後，「醫生陰謀」被證明子虛烏有，挨整者紛紛得到昭雪，整人者受到懲處，季馬舒克的勳章也被取消。這個小人物在這場不是她所能控制甚至也不是她所能理解的驚濤駭浪中的命運沉浮，特別引起我的同情。但她也是我考察政治運動中的群眾心理學的一個不可多得

的標本。在一場毫無道理可言的政治運動中，一個只認死理的小人物要麼面臨自己死無葬身之地的危險，要麼對他人構成極大危險。

所以我對巴金老人所提倡的「講真話」歷來持有不同意見，雖然剛剛辭世的巴老是少數幾個我極為尊重的中國知識份子之一，但他「講真話」的原則未免把複雜的事情過於簡單化了。人不可以單憑自己講了真話而沒有講假話就問心無愧的，須知有時候講真話也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製造災難，來傷害無辜的人。更何況由於人的認識的有限性，人並不總是能夠辨別甚麼是真話，而甚麼只是自己以為是真話。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甚至

連自己所說出的話是不是「真誠的話」都無法肯定。如本書結尾在引用了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 在斯大林葬禮上的致詞後所意味深長地說到的：

並不僅僅是偽善使莫洛托夫在心中珍惜斯大林的「不朽的名字」；也不是偽善使得愛倫堡在斯大林的葬禮兩天之後說：「斯大林不朽。」像他之前的很多人一樣，只要斯大林需要，莫洛托夫肯定會將斯大林的名字掛在嘴上說到死。探討這種不可知的忠誠的原因將會把我們真正帶向內心的黑暗深淵，而在對斯大林的「醫生陰謀」這個巨大迷宮的調查中，我們僅僅達到了深淵的入口。

##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5年12月號、2006年1月號

### 第45期 2005.12.30

- 廖久明 救亡再次壓倒啟蒙——「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 李巧寧 1950年代農民流向城市現象考察
- 李朝軍 從爭取平等到爭奪領導權——從中蘇論戰的主題演變看其實質
- 王建華 威權主義政治下，政黨話語的雙重性分析
- 王禮鑫 激勵與約束制度重建中的「改革徘徊」——以北大人學制度改革為個案的研究
- 侯其強 地理勢態與教育取徑——以西江學院創建為例
- 易 彬 流亡之書，失敗之書——關於北島散文集《失敗之書》的幾則閱讀筆記
- 熊 凱 近十年來荊公新學研究述評
- 施用勤 雙重曲解下的托洛茨基——評杜應國〈關於托洛茨基及其評價問題〉
- 許德發 評許紀霖著《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

### 第46期 2006.1.27

- 陳夏紅 錢端升：「我大大地錯了」
- 賈慶軍 另一種「美國例外論」的產生——莫斯科的權力鬥爭與美共「美國例外論」的產生
- 辛本健 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及其對中國安全的影響
- 楊振傑 從「代耕」到「租種」：免稅背景下農地經營方式之轉變——湖北三個村土地經營方式的調查與思考
- 袁 瑾 《廣州地理》的城市敘述學芻議——兼論《南方都市報》的媒介書寫與空間生產
- 王雅璋 房地產市場：一場有組織特徵的社會決策過程——兼與孫立平先生商榷
- 顧紅亮 梁漱溟的鄉村概念與生活世界
- 張長虹 三百年來石濤形象重構問題的歷史考察
- 劉晨光 施特勞斯拯救「歷史」
- 方維保 人民·人民性與文學良知——對王曉華先生批評的回覆
- 潘志新 評蓋爾納的《民族和民族主義》